

周易文化研究

ZHOUYI WENHUA YANJIU

第七辑

主编 张涛

SSAP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周易

文化研究

第七辑



ZHOUYI WENHUA YANJIU

主编
张
涛



社会
科学
文献
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周易文化研究·第7辑 / 张涛主编.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 - 7 - 5097 - 8648 - 2

I. ①周… II. ①张… III. ①《周易》—文集 IV. ①B221.5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06716 号

周易文化研究(第七辑)

主 编 / 张 涛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张倩郢

责任编辑 / 张倩郢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7.5 字 数: 490 千字

版 次 /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8648 - 2

定 价 / 8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周易文化研究》编辑委员会

编委会主任 余敦康

主 编 张 涛

副 主 编 邓瑞全 段同生

委 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 岗	王 铁	王晓毅	邓骏捷	邓瑞全
任士英	刘长林	刘炳良	许钦彬	孙照海
李景林	杨庆中	杨易林	杨效雷	吴长庚
汪学群	张 涛	范立舟	林浩湖	胡友鸣
胡汉生	段同生	袁江玉	袁法周	贾贵荣
章伟文	董晓宇	韩增禄		

编辑部主任 邓瑞全 (兼)

执行编辑 傅海燕 张玲莉 张沫飞 徐慧韬

主 办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易学文化研究院
中国易学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
河南省中原塑料机械有限公司
澳门方明国际有限公司

目 录

近年来易学研究的新进展	张 涛 / 1
由数字卦材料看《易经》在西周时期的发展	王化平 / 7
《周易》文化视野下的秦汉都城遗址	姚草鲜 杨效雷 / 24
简析司马迁易学观的形成	孔令昂 / 35
贞观君臣与《周易》	孙世平 / 41
王安石的易学与新学	刘炳良 / 54
王安石与程颐易学诠释及思想之比较	姜海军 / 70
论程朱、陆学主流学派观照下的“史事宗”易学的历史维度 ——史论与史料的择取	曾华东 / 85
蔡清易学述略	任利伟 / 92
黄宗羲《易学象数论·六壬·伶州鸠七律对》研究	林金泉 / 103
略论史事易学在元明清的发展及其价值	续晓琼 / 140
“河图洛书”新探	程献忠 / 152
河图洛书之系列研究	袁 立 / 166
《周易》与《黄帝内经》思维认识初探	具隆会 / 199



《焦氏易林》中的鸟情风角术与式法及杂占	刘银昌 / 246
《周易》理性文明与古希腊理性文明比较研究	杨满忠 / 255
中国风水文化对日本住宅设计的影响	周雷 / 263
易学智慧与企业管理	韩增禄 / 272
易学的当代价值	王卫江 / 318
《易经》是我国大学校训的重要来源	王志轩 贾兵 / 324
易学与易道——《王少英论易》序	邓瑞全 / 356
帛书《繆和》首章校释	孙航 / 359
台湾高校易学论文目录	张金平 陈咏琳 / 372
附录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易类》(四)	
.....	《周易文化研究》编委会整理 / 390

近年来易学研究的新进展

张 涛

摘要：《周易》作为群经之首，是一部流传久远且对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具有深远影响的重要经典，对于《周易》的研究也从古一直延续至今。近年来易学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易学文献的整理编纂工作逐渐完善，《周易》经传及易学史的相关研究持续扩展，国外学者对《周易》及其相关领域进行了大量的翻译和研究工作，出土易学类文献的整理研究工作也不断有新的成果推出。王化平博士的《万物皆有数——数字卦与先秦易筮研究》是近期易学研究新进展的一部代表性著作。

关键词：易学研究新进展 数字卦 出土 易学文献

《周易》为群经之首，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文化经典，是中华文化重要的源头活水，是中华民族精神和智慧的集中体现，易学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潮、主旋律，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发展的影响至深至远。《周易》天人合一、太和中正的和谐思想，自强不息、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厚德载物、海纳百川的包容态度，居安思危、慎终敬始的忧患意识等，都已融入中华民族的人文心理和价值观念之中，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周易》一书以其宏富的内容、精深的思想，传承不绝，历久弥新，数千年来始终受到人们的特别推崇和高度重视。几千年来，人们对《周易》和易学的研究从未间断，至今依然热度不减，高潮频起，业已成为全球性、国际性的学术研究课题。近年来，关于《周易》和易学的研究更是有了突出的进展，大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易学文献整理编纂的新进展

北京大学《儒藏》工程是一项重大的学术文化项目，陆续出版发行的《儒藏》精华编收入易类著作34种，除了中国历史上有影响的著作之外，



还择要收录了韩国、日本、越南历史上以汉文写作的易学文献典籍，以及一些出土文献资料如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周易》、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等。这些著作在编纂过程中一仍底本原貌，进行简要校勘，校记力求规范、精炼。

2013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易学文化研究院主持的《中国易学文献集成》68册，收入了元代及其以前有代表性的易学文献约250种，1000余卷，均选精刻善本影印，堪称前所未有的易学文献集成。元代之后的易学文献，将以续编形式陆续推出。

最近，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易学文化研究院与国学网合作整理编纂《中华易学全书》，包括《四库全书》经部易类177种典籍，1757卷，2800多字，2000多幅易学图片。目前点校整理工作已基本完成，易图绘制也已顺利结束，计划由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正式出版，至迟于2016年全部出齐。《中华易学全书》将按照《易经》六十四卦之数分装64册，采用繁体字横排，断以新式标点，特别是用计算机绘图软件重新绘制了2000多幅高清易图，将古老的易学经典以全新的面貌呈现出来。

二 《周易》经传与易学史研究的新动向

近年来，一批学者致力于对《周易》经传与易学史的认真梳理和系统研究，目前已经初步完成对秦汉、魏晋南北朝、宋、元、明、清易学史的梳理和探索，并提出了一些颇有创新开拓的论点。比如，关于《易传》的学派归属，有学者认为，把《易传》简单归入儒家或道家都是存在问题的，《易传》是综合百家、超越百家的产物，儒家、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兵家等诸家的思想在《易传》诸篇形成的过程中都有所展现。

又如，以往人们往往专注于历史上的那些易学名家、易学专著，近年的易学史研究则出现了新的特点，就是把易学置于中国整个文化思想的大格局下进行全方位审视，对易学的研究对象重新加以界定，这就大大拓宽了易学的研究范围，能够把许多并非专以易学名家但确与易学有关的人物及思想都囊括进来。新近面世的《经学大语境下的胡瑗易学》（王洪霞）、《苏轼与〈周易〉》（徐建芳）、《以易测天——黄道周易学思想研究》（翟奎凤）、《康雍乾三朝易学研究》（袁江玉）、《康有为易学思想研究》（张绪峰等）等一批专著，应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推出的。

三 国外易学研究的新成果

易学的国外传播与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也不断有新的成果推出。《周易》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是人类文明共同发展的成果。国外易学发展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部中华文化对外传播、中外文化交流互鉴的历史。目前《周易》已先后被译为拉丁文、德文、法文、英文、日文、朝鲜文、俄文、荷兰文等十多种文字。各国纷纷建立从事《周易》和易学研究的学术组织，手段和方法不断创新，成果和著述层出不穷，其中更是不乏拥有国际视野和全球意识的佳作。国外易学已成为易学研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成为国内学者从事相关研究的重要的他山之助。

在这中间，《周易》的外文译本发挥着重要作用。20世纪初，德国学者卫礼贤致力于对中国典籍的德译，曾翻译大量中国文化典籍，其中《易经》译本是卫礼贤花费时间和精力最多的译本，是在卫氏听取了劳乃宣详细而深入的文本解释的基础之上，加上他自己的西学背景翻译而成的。瑞士著名心理学家荣格曾称赞该译本：“在西方，它是无与伦比的版本”，“为理解《易经》原文的象征意义尽力开辟道路”。该译本已再版20多次，成为西方公认的权威版本，相继被转译成英、法、西班牙、荷兰、意大利等多种文字，传遍整个西方世界。2013年6月，岳麓书社出版了汉德对照的卫氏译本（张善文今译）。

国外汉学家在易学领域的耕耘、创获也是令人欣喜的。美国汉学家夏含夷教授早年撰写了博士学位论文《周易的撰著》，利用甲骨文、金文及传世的《诗经》互相比较考证，证明《周易》是公元前9世纪的作品。近年夏氏则更加注意以最新出土的文献来进行易学研究。比如夏氏认为，上博简《周易》足以表明在不晚于公元前3世纪时，这一文献就大体以今本的形式在流传了。著名美籍华人成中英教授作为公认的“第三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近年特别关注《易经》管理哲学，为易学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日本学者池田知久教授，长期研究先秦思想和先秦文献，尤其重视易学研究，撰有《周易与原始儒学》等文章，并通过对今本《周易》与马王堆帛书《周易》的对比分析，来具体讨论《周易》与原始儒学的关系以及儒学早期发展历史和《周易》哲学诞生等问题。池田教授关于上博简《周易》等方面成果也受到广泛关注。

四 出土易学文献的新发现

20世纪20年代，王国维先生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的演讲中曾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20世纪易学研究的新发现，乃是一大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出土易学文献的出现，其中重要的有敦煌卷子《周易》、马王堆帛书《周易》、阜阳汉简《周易》、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周易》等。随着这些文献的公诸于世，许多学者又开始了出土易学文献的研究并将其与传世文献相互释证。

近年来，随着清华简《筮法》的公布及其研究成果不断出现，出土易学文献研究又出现了新的热潮。根据有的学者研究，清华简《筮法》当是战国时人总结数字卦筮占方法并开示典型案例的著述，为三《易》之外的术数类卜筮之书。它系统确证了数字卦的真正存在，可归于早期“《易》家候阴阳灾变书”之类，孟喜、京房或受到过其影响。《筮法》卦图可证四时、五行、八卦相配的情形在先秦已然发生，而不是晚至汉代。就卦名、次序、写法等内容来看，《筮法》确与《归藏》密切相关。这为研究先秦易占筮法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资料，也为厘清秦汉易学传承提供了新的思路。

以上是笔者对近年来易学研究新进展的大体总结和基本认识，其中或有不当和疏漏之处，还望方家指正。

我们注意到，在从事易学研究特别是出土易学文献研究的学者当中，西南大学王化平博士是一位具有代表性的青年学者。化平博士曾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西南少数民族数占和数字卦的比较研究”、教育部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项目“20世纪以来《易经》新释的整理与研究”，出版《帛书〈易传〉研究》（巴蜀书社2007年版）等著作，在《考古》《周易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成果颇丰。如今，化平博士又推出新著《万物皆有数：数字卦与先秦易筮研究》，集中收录了他最近一段时间关于易学问题的思考和心得，其中多有独到之见和精彩之笔，为易学研究的新开拓、新进展做出了贡献。阅读此书，笔者认为它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色和优点。

第一，坚持王国维先生“二重证据法”的学术传统，坚持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之间的相互释证，既看重出土文献的独特价值，又强调传世文献在解决关键问题上的不可或缺的作用。陈寅恪先生曾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

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日本学者池田知久教授也说过：“对中国思想史研究而言，简帛等新出土资料所具有的意义是决定性的，过去那种仅仅利用传世文献从事研究的方法，已经无法期待取得什么进步。这虽然是事实，然而这并不等于说传统文献及其研究就无意义、没必要了。传统文献及其研究的意义和必要性只是被附加了若干限制而已”。“为了促进研究的进步，把新出土资料和传世文献有效结合起来，是当今最为重要的课题。”化平博士谙熟今本《周易》及《左传》《国语》等古代经典，又对甲骨文、金文尤其是新近出土的简帛文献有着全面考察和系统研究，他将二者完美结合，综合融会，自然使本书成为经典的“预流”之作。应该指出的是，化平博士早在其专著《帛书〈易传〉研究》中已经有过对出土文献研究方法和态度的深度思考，并且一以贯之地坚持至今，令人敬佩。

第二，注意借助少数民族文献来开展相关研究。陈寅恪先生在阐述王国维先生“二重证据法”时强调，“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徐中舒先生则有“三重证据法”推出，即在二重证据的基础上，运用边裔的少数民族包括民族史、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史料来研究先秦史。杨向奎先生也曾主张，纸上的文献材料、地下挖掘出的考古材料和民族学的材料皆可作为史料证据。遵从先贤遗教，化平博士长期关注西南少数民族数占与数字卦的比较研究，并在运用汉语文献材料的同时，将少数民族特别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相关材料引入其中，加以互证，多有新见，多有创获，这在书中有着突出的表现。

第三，注意象数之学与义理之学的有机融会。学者治《易》，一向有象数、义理之分，两者之间多有歧见和纷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易学的健康发展。《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序》曾说：“《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于机祥，再变而为陈、邵，务穷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其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又《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化平博士既用象数考论，同时对义理之学的认识和把握也是非常精准的、到位的，这在书中有着充分体现。实际上，就易学发展的规律

而言，只有将象数、义理熔为一炉，并重兼治，综合考察，才能在易学研究领域有所突破、有所开拓。

第四，注意文献考证与理论阐发的辩证统一。如何评定、衡量著述的高下，清儒章学诚《文史通义·答客问中》有一段著名的话：“由汉氏以来，学者以其所得，托之撰述以自表见者，盖不少矣。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在章氏看来，“独断之学”与“考索之功”，即独到的理论见解和扎实的文献考证功夫，两者只要能居其一，就非常难得了，但最高境界则是兼具两者，兼具“独断之学”与“考索之功”。在本书中，化平博士不仅考证精详，注解确当，而且在理论抽绎和宏观把握方面也富有新意，多发前人未发之覆，颇具开拓性、原创性，呈现出了理论总结与文献考证、“独断之学”与“考索之功”的有机结合，相得益彰。

总之，不论是就研究内容而言，还是就学术理念和治学方法来说，化平博士的这本新著都具有突出的学术启发意义，很好地体现了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学术精神，堪称上乘之作、成功之作，相信会大大有助于易学研究、出土文献研究等领域的不断深化和拓展，值得学术界热切期待和高度关注。

（本文原是作者为王化平等著《万物皆有数：数字卦与先秦易筮研究》一书所作的序，题目为作者后来所加。该书已由人民出版社于2015年6月出版）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由数字卦材料看《易经》 在西周时期的发展*

王化平

摘要：根据考古发现的一些数字卦材料，六爻卦与重卦是有区别的，重卦必然是六爻卦，但六爻卦未必是重卦。从西周陶拍、高青卜骨上的数字卦看，早期的重卦并非用阴、阳爻画记录，用两个符号记录的重卦是后来发展的结果。《易经》的象数体系是在西周早期以后逐渐发展出来的，与之同时，卦爻辞系统也被逐渐整理，并在西周晚期形成今本《易经》定本。从考古材料看，《易经》的早期发展应有民间巫觋的参与，但最后的提炼加工，并撰成今本《易经》象数、卦爻辞系统的应该是西周王室巫史职官。

关键词：数字卦 文王重卦 文王演《周易》 巫史 王官

讨论《易经》在西周时期的发展，首先要面对的就是“文王演《易》”的传说。目前所见文献中最早将周文王与《易经》联系起来的或许是《系辞》，其下篇云：“易之兴也，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虽然以为《易》之兴起与文王有关，但文字间的推测语气是很明显的^①。后来经过司马迁、班固等人的叙述，推测变为肯定，而且有了更翔实的细节，比如《汉书·艺文志》认为：“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系辞》所说“《易》之兴也”是语焉不详的，班固的叙述中则分为重卦、撰卦爻辞两条。不过，

* 基金项目：西南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编号：SWU1309001。

① 近年有学者认为这段材料并非推测语气，参见廖名春《从帛书〈易传〉等文献论〈周易〉本经的作者问题》，《帛书〈易传〉初探》，（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8，第232~245页；李锐《〈周易〉与周文王关系补论》，《周易研究》2014年第3期。



两汉时关于重卦之人本就有多种说法，后来孔颖达撰《周易正义》，特意在“卷首”讨论“重卦之人”，说：“然重卦之人，诸儒不同，凡有四说。”辨析之后认为：“今依王辅嗣以伏羲既画八卦，即自重为六十四卦，为得其实。”^①

由于时代久远，文献稀少，虽然历代均有学者考证重卦之人，但终究难有定谳。直到三十多年前，张政烺先生提出数字卦问题，将古文字学界此前一直认为是“奇字”的，用数字组成的符号转写为阴阳爻爻卦，这才使争讼了两千年的问题有了解决的可能。由于在张政烺先生收集的材料中，有刻在商代甲骨上的用六个数字组成的卦形，故此不少学者认为在商代已经有重卦，“文王重卦”说显然不可信。但是，传说的存在必然有一定的背景或史实，因此学界又对“文王演《周易》”的传说做出了各种不同的解释。例如姜广辉先生认为：“文王、周公不曾重卦，也不曾作卦、爻辞，而是作了‘演德’的《易象》。”^②邢文先生则认为：“‘文王演《周易》’演的并非《周易》之卦，而是《周易》之数。”^③廖名春先生认为：“周文王囚于羑里时，对六十四卦的卦序作了一定的编排，以至形成了今天通行的卦序，这是所谓的‘演’；文王又将六十四卦系以一定的卦辞和爻辞，这是所谓的‘增’；文王所系之卦、爻辞，后来又经过周公的改编、加工，以至最后形成《周易》本经。”^④

很显然，“文王重卦”说已经基本被否定，学界的研究重点转向探究“文王演《周易》”传说的其他内涵。换而言之，情形已经发展成探讨《周易》在殷周之际的具体变革问题。但从目前数字卦的研究以及新近公布的材料看，除学界关于重卦起源的认知存在误区之外，关于“文王演《周易》”传说的内涵、《周易》与周文化之关系等问题，仍有许多值得探讨的空间。

一 重卦六爻是六爻卦，但六爻卦未必是重卦

首先，笔者想明确两个概念，即六爻卦和重卦。本文所说“六爻卦”是指由六个数字或其他符号组成（阴阳爻或其他目前未知的符号）的用于卜筮

① 孔颖达：《周易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影印本，中华书局，1980，第9页。

② 姜广辉：《“文王演《周易》”新说：兼谈境遇与意义问题》，《哲学研究》1997年第3期。

③ 邢文：《“文王演《周易》”考辨》，《哲学研究》2011年第3期。

④ 廖名春：《文王演《周易》的真相》，《中华遗产》2007年第7期。

的卦形，有些学者也称之为“六画卦”。不管名称为何者，都强调此类卦形是由六个数字或符号组成。在张政烺先生最早公布，以及后来一些学者补充的材料中，殷商甲骨上确有六个数字组成的卦形，比如安阳殷墟发现的“易卦”卜甲^①，上面有“六七一六七九”等三个六爻卦^②；四盘磨发现的“易卦”卜骨^③，上面有“八六六五八七”等三个六爻卦。它们记录卦形所用符号不是阴、阳二爻，而是一、五、六、七、八、九这些数字。这些材料充分说明殷商时代已有卜筮，且用六爻卦。这就是后来许多学者否定“文王重卦”说的主要理由。

现在所用“重卦”这个概念可能源自《系辞》，其说“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等，都是强调八卦重叠组成六十四卦。因此，易学界通常用“重卦”这个概念指由乾、坤、震、巽、坎、离、艮、兑这八经卦两两重叠组成的六十四个卦形，或即别卦。换一个角度看，“重卦”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组成“重卦”的八经卦皆有卦象，此即“象在其中矣”；二是“重卦”总共只有64个。

由于很多学者将数字记录的“六爻卦”转写为易卦，遂使人们很自然地认为殷商甲骨、青铜器、陶器等上面的六爻卦就是重卦，进而得出文王之前，或文王时期就已有重卦的看法。但事实上，这种转写忽视了数字卦的特点，没有注意到不同时期之数字卦的差异，因而存在误解。

在2013年底公布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肆）中有一篇《筮法》，它详细记录了一种数字卦的原理和占辞。其中出现了用阴、阳两爻记录的八经卦，但没有出现重卦^④。之所以存在这种现象，一方面是因为在《筮法》的理论中，某些数字是有特殊含义的，在记录卦形时需要保留这些数字以供巫史分析；另一方面是因为《筮法》用四个八经卦组成一个“四位”卦形，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周易》“重卦”的形式。比如第二节中的一个卦形及占辞^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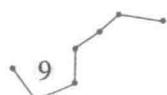
① 肖楠：《安阳殷墟发现“易卦”卜甲》，《考古》1989年第1期。

② 为排版方便，这里将原本纵写的卦形左旋90度，变为横写，以下同。

③ 此条卜骨最早见载于郭宝钧《一九五〇年春殷墟发掘报告》，《中国考古学报》第五册，第55~56页。后来曹定云《殷墟四盘磨“易卦”卜骨研究》一文载录了拓本与摹本，参见《考古》1989年第7期。

④ 李学勤：《清华简〈筮法〉与数字卦问题》，《文物》2013年第8期。

⑤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肆），中西书局，2013，第82页。



兌 巽
二 兌
女，參（三）男同
乃導（得）。

四个经卦分居上下左右，形成一个“四位”卦形，其中左上、左下分别是震、巽，右上、右下分别是坎、震，震、坎均是阳卦，巽为阴卦^①，故占辞说“三男同女”。这种形式的卦形此前在包山楚简、天星观楚简和葛陵楚简中都曾出现，以前学者多将它们看成是左右两个重卦并列，现在看来是错误的，这里面根本没有重卦。清华简、包山楚简等都是战国时期的文物，它们所用筮法需要四个八卦卦形，这或许是比较复杂的形式。在此之前，有没有可能存在一种简单一点，重叠两个八卦的形式呢？笔者认为很有可能存在。理由有三点。

第一，《周易》六十四卦的卦辞、《彖传》和《象传》对卦象的阐释以及《左传》中的筮例表明，根据上、下卦的卦象推演吉凶完全可行。

在《周易》中有卦辞，且在发展史上可能存在一个以卦为占的阶段，这不仅为很多学者所认可，而且在卦辞中有体现。比如咸卦卦辞云：“亨，利贞，取女吉。”所谓“取女吉”应该是因为咸卦震下兑上，正是一男一女之卦。家人卦离下巽上，两个均是女卦，故卦辞说“利女贞”。姤卦巽下乾上，一男一女卦，且长女主于内，女性强势，故卦辞说：“女壮。勿用取女。”渐卦艮下巽上，也是一男一女之卦，故卦辞说：“女归吉，利贞。”这种与《筮法》相同的解卦方法在卦名上也有体现，如归妹卦兑下震上，是一男配一女，名之为归妹，正好指出了重卦的特点。

在《彖传》《大象传》中，多见通过分析上、下卦的卦象演绎吉凶，推阐哲理的内容。它们使用的这类解卦方法应该有一定的渊源。比如《左传》《国语》两书记载的22个用“易”筮例中，主要通过演绎上、下卦之间的关系来分析吉凶休咎的。这些筮例中也有少数静卦，如《左传》僖公十五年载卜徒父筮而遇蛊、成公十六年晋侯筮而遇复。前者就是以上、下卦象为据分

^① 其实阴、阳这组术语在《筮法》中出现得极少，远不如男、女这组概念的被重视程度。

析吉凶，后者则引繇辞分析吉凶。

第二，《尚书·洪范》记载占卜云：“曰贞，曰悔。”^① 贞、悔即内卦和外卦，此条记载说明在商周之际确实存在重叠两个八卦以占吉凶的做法。

在西周甲骨、青铜器上出现了许多用六爻卦占筮的例子，比如周原遗址内出土的一片卜骨上有如下文字和数字卦：

翌日甲寅其商，由瘳。
八七五六八七
其祷，由又（有）瘳。
八六七六八八
我既商，祷，由又（有）。
八七六八六七^②

每一个六爻卦对应一段占辞，显然每一个六爻卦都具有明确的吉凶意义。这些六爻卦的解卦原理可能与《筮法》所载占例类似，即通过分析经卦之间的关系，并结合某些数字的特殊含义来预测事态发展。考虑到上例中只出现五、六、七、八这四个筮数，因此也可能是仅仅依据上、下卦的关系来预卜吉凶，就像咸、渐、家人这些卦的卦辞表现得一样。

在已经发现的殷周数字卦例中，单个六爻卦最为多见，两个六爻卦并列的形式则极其少见。在仅见的几例中，显然不是变卦，而是先后占得的两个卦。比如北京出土的西周甲骨^③：

六六六六七七
七六八六五八

无论以哪一个为本卦，都可看出数字的变化是没有规律的，因此不是变卦。虽然目前还难以考证更加具体的情况，但可以相信的是，六爻卦确实是可以在筮的。据《洪范》记载，以及《左传》《国语》中的筮例和清华简

^① 郑玄云：“内卦曰贞，贞，正也。外卦曰卦，卦之言晦，晦犹终也。”《说文·卜部》：“卦，易卦之上体也。”《左传》僖公十五年：“蛊之贞，风也；其悔，山也。”“风”是指内卦为巽，象风；“山”是指外卦为艮，象山。

^② 释文据李学勤：《新发现西周筮数的研究》，《周易溯源》，巴蜀书社，2006，第238~239页。

^③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镇江营与塔照：拒马河流域先秦考古文化的类型与谱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彩版6：3。据考古报告，此件卜骨当属西周中期以后，春秋早期之前的遗物，参见第388、402页。